

The China Path to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转型与发展之  
中国道路

• 中英双语版 •

洪银兴 (Hong Yinxing) 著

尹晓煌 (Xiao-huang Yin) 主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The China Path to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 经济转型与发展之 中国道路

JINGJI ZHUANXING YU FAZHAN ZHI ZHONGGUO DAOLU

• 中英双语版 •

洪银兴 ( Hong Yinxing ) 著

尹晓煌 ( Xiao - huang Yin ) 主译

## 内容提要

本书为中英双语对照阅读图书,为国内外读者高度概括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特征和问题,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变化和特点,在论述过程中还对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诸如城乡一体化进程、发展知识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本书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主题,有助于读者系统了解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转型与发展之中国道路 / 洪银兴著; 尹晓煌主译.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04-039235-7

I. ①经… II. ①洪… ②尹… III. ①中国经济-转型经济-研究②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5996号

策划编辑 丁艳红  
责任校对 胡晓琪

责任编辑 丁艳红  
责任印制 韩刚

封面设计 姜磊

版式设计 杜微言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33.25  
字数 61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9.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9235-00

# 作者简介

洪银兴，1987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现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商学院教授，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首席专家，中共十七、十八大代表。1991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2000年9月作为中美富布莱特杰出学者出访美国，2009年6月被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 前言

本书收录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教授精心撰写的15篇论文，深刻阐述了中国实现工业化及现代化之各种可行路径及其指导思想。通过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悉心论证，本书为理解一个常使人困惑的重要问题提供了真知灼见，即经济发展与转型是否确有“中国道路”？进言之，中国能否避开曾阻碍若干发展中国家进步的“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目前强劲的发展势头？

一方面，“中国道路”确有争议。因其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廉价劳力和能耗之增长方式，类似于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似在重复那些全球新兴经济实体曾经历的阶段。事实上，我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镀金时代》及其他著述中就曾做过此论断。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有其难以否认的独特性。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可供中国直接借鉴之经验。由于人口众多，且存在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及沿海富裕地区和贫困内陆间的巨大差异，其经济转型必须源于“中国制造”。这无论是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还是转型为以生活富裕和良性生态为主体之可持续性增长，抑或是更进一步融入当今日趋复杂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均为如此。作者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经济转型既非效仿新自由主义之“华盛顿共识”，也有别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而是扎根于中国社会进步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中，不断地磨合前进。就此而论，中国作为经济巨人兴起于全球市场及其令人惊叹之卓越成就，的确是另辟蹊径，代表了一条鲜明独特的发展道路与别样的增长方式。

换言之，中国经济转型不仅涵盖他国现代化进程所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其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国有型社会主义，也非经典资本主义，具备了中国特色，立足于中国国情。作者将此模式论证为“中国道路”，令人信服地

阐述了在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选择及超越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型的增长模式。有鉴于此，中国在过去 30 多年间创造的经济奇迹实为史无前例，其不断创新之精神和成功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

行文至此，笔者自觉已无需再加赘述本书之深远影响。作为探索中国经济转型主流学术思潮之代表作，洪银兴教授的论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去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和若干与此相关及更为广泛的议题，如中国发展模式有何形成因素？中国应如何在全球市场中为自身定位？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其崛起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有何教益？

然而，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英双语版之问世，为中外学者探讨如何更为精确地运用英语叙述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若干关键细节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有些与本书英文翻译相关事项需在此略作交代。作为本书英文版主编，笔者尽力避免了双语文本中常见的歧义与误差。例如，翻译中文习语“细节决定成败”时，笔者选择了英文熟悉的“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而非直译为“details are the key to success”。但为忠实作者原意，笔者在英译本中，通篇保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词。尽管如此译法会使英文为母语的读者略感累赘。在翻译“三农问题”时，笔者将其中文拼音及原意置于注释内。读者对英译如有疑问，可自行查看。除非特别说明，笔者查核了本书出现的英文原著引语，并将其作者及书名置于注释及参考书目内。受篇幅所限，英文参考书目仅列选了那些对于中文原著最为重要的文献。

笔者在此感谢诸位朋友和同仁，对本书之英译做出的贡献。洪银兴教授在其“后记”中，已对此给予高度赞扬。然虽已竭尽全力，差错及遗漏仍在所难免。对此，笔者当负全责，仅希望这些英译瑕疵不致影响读者理解这部有关当今中国经济转型极为重要与及时之论著。

**尹晓煌**（哈佛大学博士）

美国西方学院终身教授、校长顾问

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南京大学）

# 目 录

前言 .....	I
导论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	1
上篇 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中国模式 .....	15
第一章 转型经济理论 .....	17
第二章 经济转型进程 .....	31
第三章 中国渐进式改革 .....	40
第四章 市场秩序建设 .....	53
第五章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改革 .....	69
第六章 开放型经济模式转型 .....	78
下篇 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 .....	89
第七章 经济发展动力 .....	91
第八章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102
第九章 新经济及其影响 .....	119
第十章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	128
第十一章 城乡发展一体化 .....	138
第十二章 三农现代化 .....	152
第十三章 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 .....	164
第十四章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发展 .....	172
后记 .....	185
参考论著 .....	188
索引 .....	190

# 导论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sup>1</sup>

产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发展经济学，以刚刚取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对象，这些国家面临的任务是摆脱贫困，推动发展，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起飞。因此发展经济学是摆脱贫困的经济学，是推动发展实现起飞的经济学。应该说，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指导作用，例如，以高积累高投资率支持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工业化等。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相应的，发展经济学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否则难以继续起理论指导作用。

## 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发展经济学

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脱胎而来的。从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在 2010 年达到世界第二。这个世界第二的地位，是有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等处于世界前列的指标支撑的。这不仅表明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首先，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同时，贫困人口也显著减少；其次，到 2011 年农业比重降到 10.1%，工业比重达 46.8%，城市化率也过了 50%，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进入新的历史起点后，指导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就需要有重大发展。这就是，由摆脱贫困的发展经济学转向富裕人民的经济学。与此相应，发展经济学就要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现代化。摆脱贫困与富裕人民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同阶段。前者的发展目标是小康，后者的发展目标是现代化。富裕人民阶段的发展规律与摆脱贫困阶段的发展规律有明显的不同，与此相应的发展方式也不同。因此发展经济学作为富裕人民的经济学就成为指导现代化的经济学。

历史学者对现代化基本上研究的是先行发展国家（现在的发达国家）的



现代化进程，回答“现代化为什么在西方国家首先发生”、“它们如何实行了现代化”、“现代化应当怎样进行”等问题。<sup>2</sup>尽管其研究可以给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借鉴，但它毕竟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现代化理论。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与发达国家已经经历的现代化进程还是有区别的。

从理论指导上考虑，现代化需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就需要经济学的介入。已有的发展经济学只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发展经济学，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起飞后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较少。要使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继续起理论指导作用就要进行理论创新。现代化既涉及现代化的结果，又涉及现代化的进程。虽然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但最为基础的还是经济现代化。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只是关注其结果的评价指标，更应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规律，关注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尤其是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人均 GDP 2011 年达 5 414 美元，世界排名第 89 位，标志着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也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能力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理论主要服务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的。其背景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 2007 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 GDP 为 3 000 至 5 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 万美元。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发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其次，其在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如粗放型发展模式和依赖外资外需的模式）。第三，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推动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在这个阶段集中爆发，一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二是腐败指数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因此产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严重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从而使这些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发展经济学在中等收入国家起点上指导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理论指导。根据上述关于产生“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理论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不能把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所采取的那种发展方式延续到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目标是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具备与富裕国家竞争的能力。二是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以公平正义来克服社会矛盾。这些就成为在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上的发展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依据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总结的科学发展观就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道路，主要涉及：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科学发展观的这些思想贯彻到发展经济学中，就可能成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的中国当代的发展经济学。

除了上述理论进展外，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对现实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需要有世界经济大国的创新思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重新定位，把握好自身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而创新发展模式。

## 二、消费拉动和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

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有的增长方式基本上与哈罗德-多马模型相一致，该模型以 GDP 的增长为目标，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支持高投资的高储蓄不可持续。而且，投资拉动的实质是为生产而生产，由此产生的一般领域的产能过剩导致增长效益明显下降。投资拉动方式愈来愈成为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投资拉动型经济在我国已走到尽头，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变在低收入国家阶段实行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是突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意义在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

以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以增加人民收入，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导向，属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这体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即由单纯追求 GDP 的增长转向追求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一直强调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这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是在这种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才能得到实现。

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发展角度讲提高收入，就要建立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增长的机制，适应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富裕人民的要求。富裕人民不只是指提高居民收入，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居民家庭财产明显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随之增加。二是居民享有更多的公共财富，特别是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此基础上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是人民富裕程度的集中表现。

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突出公平性增长。在我国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时，在拉动经济增长时明确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这与当时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一致的，旨在从提高效率和充分调动增长要素（主要是投资）方面解决发展的动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能否延续这个大政策，就需要研究了。如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有可能的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正在接近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这个时候就要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要求。与此相应，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公平性增长即包容性增长，其内涵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大多数人富起来，从而使人民在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的成果中产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公平正义不是要拉平收入，而是要克服权利不公平造成的分配不公平问题。权利的不公平除了包括需要通过严格的反腐败措施来克服的以权谋私问题外，最为突出的是，首先解决垄断地位维持高收入的问题，其次是克服由资产分配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公平正义需要解决低收入者问题。研究发现，低收入者的消费弹性是最大的。中国目前这部分人的数量是最大的，其中大多数将上升为中等收入者，产生的消费需求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群体基本上是靠资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由此产生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之间差距的明显扩大。面对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解决低收入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领域不只是讲效率，也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二是创造条件让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面对财产分配不公所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公状况，除了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解决个人资产形成的公平原则外，还要创造条件让居民平等地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属于自己的资产。三是以公共财政制度促进公平正义。政府对公平分配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的作用除了通过国家让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外，还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已有的发展经济学面对的是处于短缺的经济，因此只是研究增加供给

的经济学。而在现阶段我国不能只是停留在生产大国地位，还要成为消费大国。相应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成为研究扩大消费的经济学，也就是发展消费经济。如果说消费需求是消费者的行为，发展消费经济则是供给方的行为，是供给方围绕扩大消费所采取的行为。与过去采取的生产适应消费的行为不完全相同，发展消费经济的目标是创造消费者，包括拓展新型消费业态，发展新兴服务消费，着力发展满足消费需求的产业等。政府也要参与和引导消费经济，其路径包括破解制约扩大消费需求的体制机制障碍，由扶持生产和研发扩大到扶持消费，特别是要致力于消费环境建设，加强质量和安全方面的供给管理，保护消费者权益，建设诚信服务体系。

显然，转向消费拉动并使经济发展目标转向以人为本，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也使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发展水平上找到新的发展动力。人民群众在分享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支持发展，减少发展带来的摩擦。

当然，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路径依赖分析，我国现阶段消费拉动需要培育，投资拉动不可能一下子放弃，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两者还需要协同作用，但转向消费拉动的方向必须明确，并且要为转向消费拉动作出努力。

### 三、创新驱动和经济增长路径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是依靠物质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这同发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经济增长模型是一致的。在该模型中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函数。后来尽管加进了技术要素，那也只是作为外生变量和“余值”起作用。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新经济并相应产生新增长理论，才有依靠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之说。

我国长期依靠物质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时矛盾就凸显出来了：一是从投入来说，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源投入不足成为越来越紧的瓶颈；二是从产出来看，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居民收入不高，根本原因是高产值、低附加值，从而收入低。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转向创新驱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从而增加附加值。

在已有的发展经济学中很少使用创新概念，较多使用技术进步概念。而在

现代，没有科技创新的概念和理论已经很难概括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了。库兹涅茨在描述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时特别关注科技创新。他认为：“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是任何重大经济增长的前提。但是在现代的经济增长中，这种创新的频率显然快得多了，并且为速度更高的总体增长提供了基础。”<sup>3</sup>库兹涅茨在这里描述的是发达国家依靠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这同样可以成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的我国追赶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结合所反映的科技创新的特征。

原有的技术进步是以企业创新为源头的技术创新，基本上是企业根据市场导向提出创新的需求和课题，以企业为主导进行技术创新。从20世纪末开始的新科技革命以及由此推动的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特点是新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和进程加快，科学的新发现直接推动技术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新突破直接推动产业创新，如新材料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这是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科技进步模式。在此背景下，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以知识和人才等创新要素为依托，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

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需要克服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跟随理论，其思想是，过去每一场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是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经济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不可能在技术进步上与这些国家进入同一起跑线，只能实施跟随策略，通过学习和引进，在发达国家之后，发展高科技和新产业。这种跟随理论在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中都会看到。

跟随发达国家之后推进的技术进步模式基本上是加工代工型和技术模仿型。这种技术进步模式基本上属于国外创新技术对我国的扩散，创新的源头在国外，采用的新技术是国外已经成熟的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我们这里。这种引进创新至多只是缩短国际差距，不能改变落后地位。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既需要也有能力创新技术进步模式。这就是不能只是靠引进和模仿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依靠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创新是指新发明第一次引入到商业中去的全过程。学习和引进新技术只能算是模仿创新。自主创新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创新。特别要注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它们会在“中国威胁论”的幌子下竭力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对中国的高技术封锁和贸易摩擦会明显加大。这就逼着我国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兴产业。

由于发展水平等原因，过去我国错过了几次产业革命的机会。而现在，

“世界是平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互动以及网络化、信息化使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对各个国家都是均等的。特别是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将会迎来新的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这次的机会不能再错过。我国的自身条件，首先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可能与其他发达国家进入了同一个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起跑线。人家能够开发的新技术新产业，我们同样也可以开发。大家机会均等，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其次是我国现阶段科学研究水平的国际差距比科技产业发展水平的国际差距小，再加上科学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性比技术的流动性强，因此推动科学和技术创新互动结合，就可能在许多领域得到当今世界最新科学技术的推动。第三是大国经济加上“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有能力在某些领域进行集中投入实现重点突破。这样，我国的科技进步路径就有条件由过去的跟随创新转向引领创新，甚至在某些重点领域实现跨越，赶上甚至领先国际水平，占领世界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

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路径，也就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现在流行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是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是指集约使用物质要素，提高要素使用的效率。尽管集约型增长方式包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没有摆脱物质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架构。而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同，根据定义，它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第一次应用和扩散，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因此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比集约型增长方式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的增长方式。

最后需要指出，尽管创新驱动将替代物质资源推动，但不等于说创新驱动不需要物质资源的投入，甚至不会减少物质资源投入，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在于，创新驱动可以使物质资源投入的效益更高。

#### 四、内需推动和经济发展引擎的转换

已有的发展经济学教材和发展理论依据亚洲四小龙发展的经验，明确把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我国前一阶段发展开放型经济，着力扩大出口导向和大力引进外资，这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明显的引擎作用，这种引擎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最为明显。

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根据出口的需要安排产业和贸易结构，安排国际竞争策略，存在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起先后爆发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直接打击的是开放型经济，不能指望今后出口需求有较大增长。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也可能是短期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的变化导致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衰减。这可能是长期的影响，主要表现是：我国的许多出口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各个国家盛行的保护主义导致国际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由于土地和劳动成本的增加，不仅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对制造业外资进入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再加上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产生了不利影响。这表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难以为继，由此提出发展的引擎由外转内的问题。

表面上看，发展的引擎由外转内是因外需不足而提出的，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自身的发展要求提出的。

首先是中国市场地位的提升。全球化经济存在中心和外围的格局。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一直在美、德、日等发达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外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开始由外围转向中心。所谓中心，一方面是指在世界一定范围内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另一方面是指中国的市场总体规模将会进入世界市场的前列，而且将会成为市场创新中心。中国市场的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意味着中国市场已经和正在成为重要的世界市场，这意味着进入中国市场也是进入世界市场。对于中国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来说，由于市场距离和信息获取等原因，交易成本会更低。

其次是中国自身发展所导致的内需的扩大。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不只是因为13亿人口，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出现了内需迅速并以较大规模扩大的趋势：第一，随着人民收入的普遍较快增长，消费需求将成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第二，随着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由于存在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会产生较大规模的内需；第三，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既会出现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又会产生高科技的新兴产业，在增强供给能力的同时将推动内需的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扩大的内需的直接效应是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进入世界市场的前列，对发展的引擎动力决不会比外向型经济小。

最后，扩大内需还会成为我国解决国内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有效途径。我国东西部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水平的差异，其中一个原因是产业分工，西部提供能源原材料，东部提供工业制成品。彼此相互提供市场。自从东部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后，东部地区工业制成品的市场转向了海外，对西部的原材料需求的依赖性也明显减弱。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东西部之间市场断裂，导致东西部差

距进一步扩大。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后，可能使东部的市场转回西部而使西部地区获得发展的机会。

以上的分析表明，扩大内需不只是扩大消费需求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内需是发展。扩大的内需是国内发展所产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大内需将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新的、动力更强的发展引擎。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挑战。”应对这个挑战的对策，就是“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sup>4</sup>。

增长的引擎由外转向内，绝不意味着回到封闭经济，它不排斥扩大出口，不排斥引进外资，不排斥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而是要转向更高层次更高效益的开放型经济。这就是借助扩大内需的机制谋求竞争优势，提升参与全球化经济的竞争能力。这就提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变，即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

我国已有的发展理论中关于比较优势的基本内容是，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突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以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发达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资源吸引和利用外资。我国已有的比较优势战略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这种参与全球化经济的基本格局虽然能够获取一定的贸易利益，但不能改变自身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市场的依附地位，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

实际上，我国已有的出口导向战略所依赖的外需是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要素的需求，不是对中国的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需求。原因是中国出口的产品的大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是国外的，品牌是国外的。因此我国出口品的附加值低。这意味着我国增长的引擎由外转内失去的外需也主要指的是这种依赖劳动力和资源比较优势生产的产品。

在我国的 GDP 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时，我国的要素供给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明显衰减，不仅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明显提高，环境约束也更为严厉；二是我国自身的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供给能力及其作用也大大增强。这种要素供给结构的变化表明，建立在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基础上的开放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我国的开放战略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资本和技术的作用。这是开放战略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的基本要求。

何为竞争优势？它与比较优势的区别是什么？第一，竞争优势理论“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的重点”，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



心竞争力的新优势。第二，竞争优势理论突出“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sup>5</sup>。在现阶段就是突出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当水平的新兴产业，形成能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显然，谋求竞争优势体现了增长的内生性和创新驱动性，是以科技和产业创新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内生的创新支持开放。由此，就可以实现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出口品对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出口品的替代，以及高科技的绿色产品对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替代。

谋求竞争优势的扩大内需不排斥利用开放型经济，在扩大内需市场的同时有必要加大力度利用国际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是要素流动为主导的经济。尤其是创新要素，不可能都从国内取得，需要通过对外开放从国外获得。原因是，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进入了世界前列，科技和产业创新可能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但是由于历史和发展水平的原因，先进的创新资源主要还集聚在发达国家。因此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重点是引进创新要素，尤其是高端创新人才。

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向内需，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外需的引擎作用，而是内需成为主引擎。

## 五、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着力点的转型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处于农业国地位，其发展的着力点无疑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我国前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也是这样。我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已经由农业国转向了工业国，城市化率也过了50%。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有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现代化。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应该是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理论。

经济学对现代化的研究并不关注其结果的评价指标，而是关注其进程和发展战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界定：一个国家从贫穷走上富有，从传统走上现代，分为六个阶段：（1）传统社会；（2）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3）起飞阶段；（4）向成熟推进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所谓向成熟推进阶段，是指社会能有效地把现代技术应用到各个经济领域；所谓高额群众消费阶段，